秦晖在对特定的、局限于较有限时间段或牵涉面较窄的历史进行描述、研究时，颇能发挥其特长，明晰清楚的逻辑推理，简洁平易的归纳梳理，加之以独到尖锐的分析总结。但在宏观维度上，虽然行文如故，言之凿凿，却不免因粗糙、笼统进而失真。

《传统十论》的首篇关于汉唐间的乡村组织一章大概是全书最少可争议之处的，新颖的角度与扎实的证据，足以在逻辑上反驳所谓“皇权不下县”式的乡村自治是两千年的传统，为更多的研究提供启发和支撑。而接下来，秦晖对法家、儒家等的分析、阐述，则不免武断、简单，只具备理论上的自洽而不具有事实上的证据，分析的过程、所得出的结论大抵似是而非，足够尖锐却不切中要害，优劣参半。

同样的症状也出现在作者的另一本代表作《田园诗与狂想曲》中，开头的田野调查所获颇有价值，但作者越写越不让思维受这区区的现实所困，漫无边际的展开，恰切合了书名的后半截。

秦晖是康德意义下的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，但却难以称之为一流的学者。他未曾进入中华古典文明的语境之中，也不愿无保留地皈依于西方的价值取向。敏锐的眼光足以发现种种荒谬，但却无法提供可供实践的创见，在东西文明之间游荡，或许在等待，等待着新的时代的到来。